

论贾谊不遇

李大明

(一)

贾谊的事迹，集中记载于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和《汉书·贾谊传》之中。《史记》载：贾谊二十余岁即为汉文帝召为博士（据清代学者汪中《贾谊年表》，时文帝元年，贾谊二十二岁。见《汪氏丛书·述学·内篇三》），一岁中超迁至太中大夫。他数上书议改制度，而文帝以初即位谦让无暇。但诸律令更定及列侯就国，其说皆自贾谊发之，于是文帝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。但朝中元老绛、灌、东阳侯、冯敬等尽害之，文帝于是疏远了他，以他为长沙王太傅。贾谊意不自得，渡湘水而作赋吊屈原，三年后又作《鹏鸟赋》自伤悼。文帝后来召回贾谊，拜梁怀王太傅。再后来，怀王坠马死，贾谊常哭泣，岁余亦死，年三十三岁。

对于贾谊的身世，历代学者作了多方面的研究，发表了不少意见。其中一个比较重要而又有异议、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是：贾谊遇不遇。

今略述历代学者的评论如下。

《汉书·贾谊传·赞》引刘向称：

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，其论甚美。

通达国体，虽古之伊、管未能远过也。使时见用，功化必盛。为庸臣所害，甚可悼痛。

案刘向之意，贾谊当时未被用，这当然是不遇了。《风俗通义·正失》记刘向与汉成帝议文帝，亦论及贾谊，详后。

班固修正了刘向的说法，提出了不同的

意见，《赞》引刘向言之后即曰：

追观孝文玄默躬行，以移风俗，谊之所陈略施行矣。及欲改定制度，以汉为土德，色上黄，数用五；及欲试属国，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，其术固以疏矣。谊亦天年早终，虽不至公卿，未为不遇也。

班固认为，汉文帝并不是没有用贾谊。贾谊的一些主张文帝是施行了的；但贾谊关于改制等主张疏阔无用，文帝当然不听他的。而贾谊死得太早，虽没有位至公卿，但不能叫做不遇。

后来的学者，有人申说补充班固的意见。如明代的何孟春《贾太傅书序》云：

或问：文帝好文之主，谊不大用，将非运也？……史固云：文帝“诸法令所更定，及列侯就国，其说皆谊发之”，帝“议以谊任公卿之位”。而短于众口，则矫矫年少实取之。今观其建白间，所谓“非愚则谀”，所谓“犹为国有人乎”，“亡具甚矣”，大臣“恬而不知怪”，俗吏“不知大体”，尽斥在廷之臣。既以为进言之不臧，又以为献计之无识。至其自许，则曰“何不一令臣得孰数之于前”，“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，致此非难”，又曰“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”。其不逊如此，欲众毋怨，得乎？

这是说，贾谊在上疏陈政事时斥责了朝廷众臣，又自许不逊，怎能不引起众人的怨恨呢？所以何氏指出：“今日之事，为庸臣所害，如史氏言，诚‘未为不遇也’”。也就

是说，贾谊自己得罪了众大臣而遭谗害，不是文帝不用。

但是问题在于：贾谊得罪汉文帝没有？学者们回避这一点。众臣进谗而得逞，根子应该在汉文帝身上。南宋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十一有《谊、向触讳》一则，说贾谊上疏于生时谈死事，又指斥了文帝，这是“触讳”，“而帝不以为过，谊不以为疑”，“文帝以宽待下，圣德固尔”。固然，贾谊之上疏言辞激越，史载文帝没有怪罪于他；但是为什么众臣害贾谊而进谗，文帝就疏远了他呢？这一问题是不能回避的。（说详后）

清代学者卢文弨《重刻贾谊〈新书〉序》亦云：

世每以文帝不能用贾生为惜。然生之言后多见之施行，则不用而用已过毕矣，在生宜可无恨。以视夫其身尊荣显赫而尺寸曾不得展者，所得为孰多乎哉！

卢氏也说贾谊虽先前不为文帝所用，但他的主张在后来多被施行，这也是“用”。

后代学者有的接受刘向的观点。如明代的李梦阳《〈贾子〉序》云：

汉兴，谊文最高古。然谊陈说治理，善据事实，识要奥，一一可措之行，盖管、晏之侔焉，故曰谊练达国体云。

这是申说刘向。而乔绍《贾生才子传序》分析道：

君子观人，当取其言之验，不当责其功之成。言之验者其常也，不验者其变也。其变其常，而功之成否系焉。……惜乎！年逾三十而夭夺之遽，徒使谊之言验于身后而莫能成功于当日也。

乔氏之意是说贾谊没有见用于当时，但其功在身后。所谓“言验于身后”就是这个意思。

其实，认为贾谊用在身后这一见解，早在唐代已有人提出。唐末的皮日休在《文薮·悼贾》中痛感贾谊不遇不用，甚至认为

“生之见弃又甚于平（指屈原）”。其文又云：

呜呼！圣贤之文与道也，求知与用。苟不在一时，而在于百世之后者乎？

这已有知与用在身后的意思了。

还有的学者注意探索了贾谊为什么当时未见用的原因。

宋代学者苏轼有《贾谊论》之文，认为贾谊之不见用，“非汉文之不能用生，生之不能用汉文也”。贾谊“志大而量小，才有余而识不足”，没有做到“使天子不疑，大臣不忌”，所以一旦不用，则以为终不复用，不能自振，至于夭绝。一句话，是“不能自用其才”。

东坡之论甚新，分析了贾谊不被用的个人因素。而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卷八则从另一角度探索了这一问题：

好乐、好勇、好货色，齐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；文帝好清静，故不能用贾谊；武帝好纷更，故不能用汲黯。

案王氏之意，贾谊之不能用，与汉文帝的治国之术有关。这一道理，明代学者李贽在《藏书·德业儒臣后论》里说得更为明白：

汉文，无为之圣人也，自以其身同于含哺鼓腹之民，而以其可为必为者付景武。虽语之有为，如风过耳。然则贾生虽一痛哭二流涕六太息，何益乎？故使汲子儒而当孝文之世，则清静寡欲，固鱼水之欢也；使贾生生孝武之朝，则三表五饵之策，朝进而夕拜爵矣。何者？孝武帝乃大有为之圣人也。

李氏认为，汉文帝是无为之君，所以贾谊不被用，这是生不逢时。这一见解，结合了汉文、汉武不同时期的政治，进行对比分析，是比较有见地的。

我们很注意以上数人对贾谊不遇的原因的意见，但要指出：贾谊不见用，固然有贾谊的个人因素，但根子在汉文帝身上。而文帝之不用贾谊，也不仅仅因为他是无为之君。这一论点，我们将在下面进行分析和论

述。

(二)

以上我们主要引证了历代学者对贾谊遇不遇这一问题所发表的意见，并概括地提出了一些看法。我们同意贾谊不遇的说法，但又认为，对于贾谊遇不遇，尚有一些问题需作进一步的探索。

贾谊有卓然命世英杰之材，是王者之佐，这一点我们并不怀疑。汉文帝很赏识他的才干，这在《史记》《汉书》里记载得也很明确。但是我们注意到，汉文帝对于用不用贾谊、如何用贾谊、为何开始用后来不用再后来又用，情况是比较复杂的。

这要从《史记·贾生列传》和《汉书·贾谊传》几处值得注意的不同记载说起。

《史记·贾生列传》记文帝从长沙召回贾谊（据汪中《年表》，时文帝六年，贾谊二十七岁），夜问鬼神事，感叹自己学识仍不如谊。不久乃拜贾谊为少子梁怀王太傅。《汉书·贾谊传》在记载了与上述相同的事迹后又云：“数问以得失。”颜师古注云：“汉朝问以国家之事。”也就是说，这不是“不问苍生问鬼神”，文帝仍以国家大事求问于贾谊。而这一点，是《史记》所未记载的。

又，绛侯周勃就国后（详后），因有人告之谋反而逮系长安狱治，后来放了，复爵邑。《史记·贾生列传》未及此事，别处也未言此事与贾谊有什么关系。但是，《汉书·贾谊传》记其《陈政事疏》（即《治安策》）言当以礼对待大臣（又见《新书·阶级》），又云：“上深纳其言，养臣下有节。”这就是说，汉文帝很欣赏贾谊提出的政策，并采纳了他的意见。而这个周勃，就是当时谗毁贾谊的人（还可能是头子）。贾谊为巩固汉家江山，不计前嫌，这一点应该得到赏识和器重。

又，《史记·贾生列传》记贾谊上疏削藩，而“文帝不听”。但是《汉书·贾谊传》记其上疏之文（即《请封建子弟疏》，又见《新书》里《益壤》《权重》二篇），并云：

文帝于是从谊计，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，……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，抚其民。

验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别处，文帝确有此举，是文帝亦用贾谊之议，非不听也。

总之，班固的记载有《史记》所未及者，亦有与《史记》不同者。对比一下可以看出，班固作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，对于贾谊的主要事迹，虽直采《史记》，但也有较大的补充，除了补入贾谊关于政事的疏奏之作，也补充甚至纠正了司马迁记载的疏略和失实，班氏所据，盖汉代其它载籍和刘向所整理的《新书》。这正如清代学者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一所云：“班固作《汉书》，距司马迁不过百余年。其时著述家，岂无别有记载？倘迁有错误，固自当据以改正。”

因此，班固论贾谊，以为“谊之所陈略施行矣”，是有根据的。而班固所谓“谊亦天年早终，虽不至公卿，未为不遇”之语，则要看对“遇”与“不遇”作何解释了。说“所陈略施行”，或者说用在身后，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“遇”。况且，贾谊从长沙被召回之后，特别是在绛侯周勃失势、灌婴去世之后，仍未重用，这恐怕仍然是“不遇”吧。

请申说如次。

《史记·贾生列传》云：

诸律令所更定，及列侯悉就国，其说皆自贾生发之，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。绛、灌、东阳侯、冯敬之属尽害之，乃短贾生曰：“洛阳之人，年少初学，专欲擅权，纷乱诸事。”于是天子后亦疏之，不用其议，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。

《汉书·贾谊传》事同。案：什么是“诸律令所更定”呢？贾谊除改制之议外，还有

《论积贮疏》（又见《新书·无蓄》），盖其所作律令；惜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未明言，故不论。而列侯就国之事，是贾谊提出，而汉文帝实行了。

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云：

二年十月，丞相平卒，复以绛侯勃为丞相。上曰：“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，各守其地，以时入贡，民不劳苦，上下欢欣，靡有遗德。今列侯多居长安。邑远，吏卒给输费苦，而列侯亦无由教訓其民。其令列侯之国；为吏及诏所止者，遣太子。”

事又见《汉书·文帝纪》。

而此令一出，元老们群起反对。当然不是公开反对诏令，而是攻击诋毁出这主意的人。右丞相绛侯周勃、大将军颍阴侯灌婴、东阳侯张敖、御史大夫冯敬都反对贾谊提出的更定律令、列侯就国等措施，于是说他“年少初学”，自然不象他们一样有赫赫功绩；说他“专欲擅权”，意在离间文帝与贾谊的君臣关系；而说他“纷乱诸事”，则表明贾谊之议已触犯了他们的利益。文帝果然疏远了贾谊，“不用其议”，并叫他离京去了长沙，不再在中央参政议政。而明代学者张溥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·贾长沙集》以为绛、灌、东阳以“武夫天性不便文学”而短贾谊，“汉廷公卿莫能材贾生而用也”，则未达其旨。

问题在于，文帝弄走了贾谊，是不是又真的“不用其议”了呢？答曰：否！

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云：

（文帝三年）十一月，上曰：“前日诏遣列侯之国，或辞未行。丞相朕之所重，其为朕率列侯之国。”绛侯勃免丞相就国。

《史记·绛侯周勃世家》、《汉书·文帝纪》《张敖王周传》亦载此事。这说明，对于贾谊提出的“列侯就国”，文帝是实行了的。文帝一方面平息了朝中元老对自己用贾谊的非难，另一方面从巩固刘氏江山考虑，也实

行了贾谊提出的措施，文帝是精于君人之术的。

但文帝同年十二月又以灌婴为丞相，贾谊不可能被召回；灌婴于文帝四年冬十二月死，贾谊还是未被召回；文帝六年，贾谊回，任梁怀王太傅。总之，再也没有任以公卿之位。

其实，早在贾谊离京去长沙时，他已经得罪汉文帝本人了。事见《风俗通义·正失》。

《正失》记刘向与汉成帝议文帝的政绩和德行，使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认识文帝的面目。刘向曰：“文帝本修黄老，不甚好儒术，其治尚清静无为”。但是，“文帝虽节俭”，未央前殿却“至奢”；又爱佞幸邓通；并从侍中、近臣、常侍、期门武骑猎于渐台，此事贾山曾谏阻。刘向继曰：

太中大夫贾谊亦数谏止游猎（“谏”原作“陈”，此据卢文弨《群书拾补》校改）。是时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，谊又恶通为人，数廷讥之，由是疏远，迁为长沙太傅。

案贾山谏猎之事，参《汉书·贾山传》所载其《至言》；贾谊谏猎事，参《汉书·贾谊传》所载其《陈政事疏》（又见《新书·数宁》）。又据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二《佞幸传》，邓通其人毫无本事，唯谨身媚上，喈帝痛疮，而文帝甚爱之。二贾谏猎，文帝听否，未见史载；而刘向说贾谊“数谏止”，则文帝至少开初是未听的。贾谊又屡次公开讥刺邓通，比太子胆子都大（太子都只能在心里恨邓通而已，事见《史》《汉》《佞幸传》），这很可能激怒文帝的。由此观之，贾谊当时不仅得罪了朝中元老重臣，也得罪了文帝佞幸，更可能得罪了汉文帝本人，焉有不疏之理？又据《困学纪闻》卷十七记宋景文云“贾生思周鬼神，不能救邓通之譴”，盖直至他从长沙回京，得与文帝议鬼论政之后，他与邓通结下的怨仇也还未了结。

本文第一部分所引历代学者探讨贾谊不遇的那些言论，未及以上分析，故申说如此。

(三)

现在，我们来讨论贾谊本人怎样看待自己的遭遇。

《史记·贾生列传》云。

贾生既辞往行，闻长沙卑湿，自以寿不得长；又以适去，意不自得。及渡湘水，为赋以吊屈原。

《汉书·贾谊传》的记载稍详：

谊既以适去，意不自得，及度湘水，为赋以吊屈原。屈原，楚贤臣也，被谗放逐，作《离骚赋》，其终篇曰“已矣，国亡人莫我知也”，遂自投江而死。谊追伤之，因以自谕。

颜师古注云：“适读曰謫。”就是贬谪之意。据周寿昌《汉书注补证》，太中大夫秩比千石，而诸侯王太傅秩尚在内史中尉之上，以秩而论，初非左官；而曰“适去”，是因为去天子之侧而官王国，所以叫做“意不自得”。贾谊认为自己的命运与屈原相似，故吊而自譬况。

《风俗通义·正失》记刘向之言则曰：

（谊）既之官，内不自得，及渡湘水，投吊书曰：“闾茸尊显，佞谀得意。”以哀屈原离谗邪之咎，亦因自伤为邓通等所愬也，

刘向明确指出贾谊自伤为邓通等人所害，盖亦包括了绌、灌诸人。

《吊屈原赋》追伤屈原，意深辞切。叹屈原不遇而曰“呜呼哀哉，逢时不祥”，悲世混浊则云“贤圣逆曳”，“方正倒植”。而其末云：

所贵圣人之神德兮，远浊世而自藏。使骐驎可得系羈兮，岂云异夫犬羊？般纷纷其离此尤兮，亦夫子之辜也。离九州而相君兮，何必怀此都也。（此用《史记》文，《汉书》文字有异，参后。）

《索隐》：“《汉书》辜作故。夫子谓屈原也。李奇曰：亦夫子不知麟凤翔逝之故，罹此咎也。”《汉书》“尤”作“邨”，师古注“邨，过也”，引李奇后又曰：“此说非也。贾谊自言今之离邨，亦犹屈原耳。”对“离九州”二句师古注又曰：“言往长沙为傅，不足哀伤，何用苟怀此之都邑，盖亦谊自宽广之言。”清代学者张文虎认为师古之说窒碍，故于《舒艺室随笔》卷五别解云：

“此言屈子遭此放逐，咎由自取，不能周游择君而恋恋于楚，以反射己之今日时势不同也。”案：我在《论王逸对评价屈原不正确观点的批评》一文中证明，贾谊对屈原的认识和评价，一方面是深表同情，悲其不遇；另一方面又限于个人生活经历和人生态度，并不真正理解屈原眷恋故国、守志不徙的伟大情怀（文载《四川师大学报》1985年第4期，可参）。所以张文虎认为他作赋指斥屈原“遭此放逐，咎由自取”，还是看出了贾谊用心。但是张文虎又认为贾谊是“反射己之今日时势不同”，这与颜师古之说并无根本分歧，因为前提都是认为贾谊吊屈原而自譬况。而且，屈原在其作品中屡斥君王，贾谊赋亦曰：“离九州而相君兮，何必怀此都也”，这里面未必没有对汉文帝的牢骚。

贾谊又有《鹏鸟赋》之作。鹏是不详之鸟，所以贾谊借以作赋，自伤又自宽。（见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本传）他自认为谪居长沙，政治上失意，思想上忧郁，故借赋鹏鸟而自我排遣、寄情抒感，非常消沉，而其旨归于老庄的宿命论思想。（汤炳正先生《屈赋新探》中有《论〈史记〉屈贾合传》一文，论之甚详，可参。）

贾谊还有《惜誓》之作，见于《楚辞章句》。王逸认为是伤悼屈原，“言哀惜怀王与己信约而复背之”，“盖刺怀王有始而无终也。”（见《楚辞章句·惜誓·叙》）但是王逸的说法并不那么可靠。我们知道，收入今

本《楚辞》中的宋玉以下直至汉代文人的作品，虽有伤屈之作，亦有不是伤屈之作；有的即使伤屈，也往往借以自伤，而王逸皆以伤屈释之，盖袭汉人师说，但并不全面中肯，这一点学术界有公论，兹不赘述。问题在于《惜誓》是不是悯伤屈原之作。从《惜誓》有不少文句同于《吊屈原赋》来看，当然不排除它伤悼了屈原；但是结合贾谊身世，我们更倾向于《惜誓》是自伤之作。

我们将二赋比较可以看出，《吊屈原赋》主旨在于伤屈而自谕；而《惜誓》则主要是抒发自己怀才不遇、遇谗离尤的心情，并表示愿远浊世而善自处，所以《惜誓》畅写超举游仙、澹然自乐之事，并云：

或偷合而苟进兮，或隐居而深藏。苦称量之不审兮，同权概而就衡。或推移而苟容兮，或直言之谔谔。伤诚是之不察兮，并纫茅丝以为索。……非重躯以虑难兮，惜伤身之无功。

案贾谊身世与屈原有相似之处，贾谊赋里也有与屈赋语意相袭、摹拟重现之句，所以有些语句难得确诂。但上引诸句与贾谊身世颇合，而“惜伤身之无功”一语，不正是贾谊自以为不为文帝所用而谪居卑湿、寿不得长的意思吗？

清代学者王夫之论《惜誓》是“惜屈子之誓死而不知变计”，指出贾谊用君子远害全身之道责难屈原，而不知屈原以同姓宗臣，不忍引去，贾谊不知屈原。（见《楚辞通释》）这一见解揭示了屈、贾思想观念上的差异，是比较深刻的，但仍囿于伤屈成说。而清代后期的刘熙载在《艺概·赋概》里认为：“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于赋寓之”，“《惜誓》，余释以为惜者，惜己不遇于时”，“誓者，誓己不改所守”。这一见解，当然比二王高明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说《惜誓》是贾谊自伤自宽之作，从《惜誓》通篇文意来看，大致不错。而且由以上分析还可以推定，《惜誓》

也作于长沙，时间大约在《吊屈原赋》之后、《鹏鸟赋》之前。

此外，贾谊在其政论文中也有不少地方言及应该远谗佞而用贤才，这未必设有讽谕寄托。如《过秦论》批评秦国多忌讳之禁，故忠臣不谏，忠言不达。这固然可以说是总结历史教训。而《新书·傅职》言当“贤人辅相”，又引《礼·明堂》称召公“洁廉而切直，匡过而谏邪”；《君道》言君“辅翼贤正则身必安”；《大政下》言“贤人不举而不肖不去，此君无道也”，“近侧者不足以问谏”是“国无人”。这些言论，如果结合贾谊的身世，就很好理解了。尤其是“国无人”一语本秦汉政治家之习语，“国无人”总与国家存亡相连，屈原《离骚》用以悲哀楚之亡国危机，贾谊又用以太息汉家政治危机（《解县》、《忧民》亦有是语，又参汤炳正先生《楚辞类稿》）；而《吊屈原赋》亦曰：

“已矣，国其莫我知，独堙郁兮其谁语？”这种将国事与个人遭遇联系起来的慨叹，将直述君侧无人与个人遭遇不用联系起来的悲哀，正是贾谊谪居时心情的真实写照。《胎教》又以“纣杀王子比干，而箕子被发而佯狂”等与燕昭王得郭隗等人相对比，以证“得贤者显昌，失贤者危亡”之理；而《惜誓》亦曰：“比干忠谏而剖心兮，箕子被发而佯狂”，这不能说没有个人遭遇的感慨。

当然，我们以上的比较，难免断章取义、牵强比附之消。因为今见之《新书》的情况比较复杂，其书可能是习于贾谊者萃其言而成，（说参卢文弨《书校本贾谊〈新书〉后》，《抱经堂文集》卷十）其内容有的是为文帝陈政事，即“事势”之类；有的是与门人讲学之语，即“连语”之类；有的是平日所称述诵说者，即“杂事”之类。（说见余嘉锡先生《四库提要辨证》）故上引《新书》诸篇，殊难编年。因此，将它们与贾谊身世相对

（下转第20页）

八十)。清代学者也多从诗乐关系的角度力辟“淫诗”之说。陈启源说：“夫子言‘郑声淫’耳，曷尝言《郑诗》淫乎？声者，乐也，非诗词也”（《毛诗稽古编》）。姚际恒说：“《集传》纰缪不少，其大者尤在误读夫子‘郑声淫’一语，妄以《郑诗》为淫，且及于卫，且及于他国”（《诗经通论》）。朴学大师戴震也说：“凡所谓声，所谓音，非言其诗也。如靡靡之乐，滌滥之音，其始作也，实自郑卫桑间濮上耳，然则郑卫之音非《郑诗》，桑间濮上之音非《桑中》诗，其意甚明”（《东原集》卷一《书郑风后》）。皆欲维护《诗经》之尊严，而否认了上古时代“诗乐一致”的客观事实。孔子论诗，偏重其音，故曰“郑声淫”；朱熹论诗，偏重其辞，故曰“郑诗淫”。其实，“郑声淫”即“郑诗淫”，而“郑诗淫”也即“郑声淫”，二者可以相通。但何者为“淫”呢？陈乔枬说：“服虔注《左传》‘烦手淫声为郑重其手而声淫过’，是知郑声之淫，非但

谓其淫于色而害于德也，亦谓声之过中耳”（《鲁诗遗说考》卷四）。马瑞辰也说：“淫之言过，凡事之过节者为淫，声之过中者为淫，不必皆淫于色也”（《毛诗传笺通释》卷八《郑风总论》）。所谓“声之过中”、“事之失节”等等，皆包含着一定时代的道德意义。同朱熹谓“郑诗淫”一样，孔子之所谓“郑声淫”云云，也只是一种道德评价而已。

总而言之，朱熹是从哲学上（“天理人欲”之辨、“思无邪”），从《诗》之本原（“美刺”之辨、《风》诗多采自民间），从《诗》的内容及其表现手法，从诗乐关系诸方面广泛论证了所谓“雅郑邪正”的问题，使孔子对当时新乐所作的道德评价与汉晋旧说系统化、理学化。但是，他最有意义的贡献却在于，他从理论与实践上承认了《诗经》中的“男女情思”之辞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这些诗歌的本来面目。我们对此应当予以充分肯定。

（上接第26页）

照，是费力不讨好的；以上对照，权且观大较而会其意，不可太落实。但是《新书·先醒》记贾谊答梁怀王问，其事当在贾谊从长沙回京任怀王太傅之后。其文言楚庄王即位三年之后，“退僻邪而进忠正”，犹“自惜不肖（‘惜’原作‘错’，据刘师培《贾子新书校补》改），思得贤佐，日中忘饭，可谓明君”；又讲虢君“骄恣自伐，谄谀亲贵，谏臣诘逐，政治踳乱”，而至死不寤所以亡。依二人问答，此固释何为“先生”，但未必没有讽谕之意。贾谊对过去遭谗见疏

的往事，即使不耿耿于怀，但也记忆犹新吧。

以上，我们对贾谊遇不遇这一问题作了一些探索，得出了初步的结论。我们知道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，文人怀才不遇不是偶然现象。贾谊是西汉前期的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，研究他的遭遇，不仅对我们研究西汉前期的历史、政治有所帮助，而且对研究汉代文学，如汉代散文、汉代辞赋、汉《楚辞》学也有所帮助。本文仅从贾谊遇不遇这一问题入手，结论也未必深刻和正确。一得之见，未免简陋，请学术界批评指正。